

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实践的三重逻辑向度研究

刘旭雯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奋斗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全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的实践经历了三重向度的探索与发展,即在历史向度上,经历了初步探寻、破旧立新、曲折发展、转型探索、深入推进、强化提升等六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基础,以党的领导作为政治保障,以经济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在价值向度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实践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相关理论,为世界各国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还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历史向度;实践向度;价值向度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1)04-0001-08

收稿日期:2021-0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的逻辑图谱研究”(20BKS026)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特色权力治理模式及其世界意义研究”(19YJC7100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旭雯(1990-),女,广西南宁人,法学博士,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1.04.001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追求共同富裕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同时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跨越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在谈到 2035 年的现代化远景目标时,首次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这是党对人民作出的新的庄严承诺。站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实践的历史演进过程,从中提炼和总结出“中国经验”,不仅对于我们实现“共富梦”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和作用,而且也是为世界各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

一、历史向度: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把人民写在了党的旗帜上,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为自己奋斗的目

标,在革命中孕育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在一路走过的风风雨雨中,无论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个性特征,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研究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进程分为六个阶段。

(一)初步探寻(1921—1949 年):开启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

长期以来,共同富裕都是人类心驰神往的理想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诸子百家的“均平”思想等都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元素,并将其作为一种高尚的核心价值内化并融入民族的血脉中。^②这些都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启对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做好了铺垫。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科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2020 年 11 月 3 日。

^② 刘长明,周明珠:《共同富裕思想探源》,《当代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也很自然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同和接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不同,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找到了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进而探索出一条使共同富裕从空想变为科学的现实路径,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早期中国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萌生出共同富裕的思想。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就曾经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①1921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宣讲时也提出了“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②的社会主义设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要带领人民走上民族独立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彻底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压在贫苦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措施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既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也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等一系列不同阶段的土地政策措施,都体现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广大农民争取利益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精神,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迈出了探索共同富裕的第一步。^③

(二)破旧立新(1949—1956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初提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首次提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毛泽东则是凝练这一概念的第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思考如何在只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的“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如何走上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也可以实现发展,但是“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④,因此中国要避免这种痛苦,就必须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一种符合国情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为共同富裕奠定制度根基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1953年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

遍繁荣的生活”^⑤。这是“共同富裕”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毛泽东同时也意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正如他所指出的,中国所实行的制度和计划,是“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⑥。如果不恢复发展生产,不以强大的经济、发达的农业和现代交通作为保障,人民的物质条件就得不到改善,共同富裕也就无从谈起。但他不认为发展生产与社会主义改造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他相信生产关系的变革将把生产力从被束缚状态中解放出来。例如农业合作化可以克服一家一户力量分散造成的困难,促进农业快速发展,进而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和原料保障;而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以社会主义工业化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同样意义重大。这一时期我国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53.2%,其中,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升了13.4%。与此同时,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也相继投产。这些都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经济基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确立,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政治上做好了铺垫。

(三)曲折发展(1956—1978年):“平均主义”下的“同步富裕”

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加上实践过程中经验和认识的不足,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三大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共同富裕”道路并没有他所设想的那样顺利。随着我国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毛泽东希望能以更高、更纯、更大规模的公有制形式去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消除贫富差距,谋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同步富裕”。这也是后来他设计人民公社模式的初衷和目的。这种“左”的思想从1957年开始抬头并逐渐蔓延。具体来说,一是在所有制形式上

① 《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② 秦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

③ 杨文圣:《党对共同富裕的百年夙愿与追求》, http://www.cssn.cn/zx/bwyc/202101/t20210114_5244632.shtml, 2021年1月14日。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⑤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取消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二是在经济手段上实行计划经济,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财政预算制度和统购统销的资源分配方式;三是在分配原则上实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取消了收入差别。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将“共同富裕”等同于“同步富裕”,片面追求公平的理想化、绝对化的做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也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和人才的浪费以及懒惰之风的盛行。再加上在这期间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些都直接造成了毛泽东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观意愿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严重偏差,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探索共同富裕的曲折过程中所蕴含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初衷、追求崇高理想和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是不容置疑的,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造成这些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底是什么还没有思考清楚,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同样缺乏经验,在物质条件如此贫乏的条件下靠“拉平”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和共同富裕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

(四)转型探索(1978—1986年):在“先富后富”中探索共同富裕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逐步改变了过去以“平均”分配方式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共同富裕”思想精髓的深刻理解和领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认识。

邓小平认为“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共同贫困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告别“贫穷”,摒弃过去将“贫穷”与“社会主义”画等号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们奋斗的目标。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在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以后,创造性地给出了以“先富”带动“后富”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答案。

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思想,强调在不背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前提下,对于有能力的那部分人和地区,只要是以不违背法律的方式富裕起来的,都应当给予支持和鼓励。但是搞两极分化不是“先富”的最终目的,而是希望整个社会在保持适当差距的同时,“先富”地区为“后富”地区树立榜样,进而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帮助

全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在具体措施上,“先富后富”思想主要包含了两条具体进路:一是以农业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即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改革作为起步,逐步向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拓展。二是“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等它们先发展起来后再帮助内陆地区共同发展,由此形成从沿海向内陆逐步开放和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主要倾向于效率优先,通过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同时我国在国家财政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也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与1978年相比,1986年这些数值成功实现了翻一番目标。

(五)深入推进(1986—2012年):在强调公平中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打破了过去平均主义的思想,纠正了人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错误认识,不仅使人民群众从普遍贫困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且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按下了快进键。但随着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也逐步凸显出来,具体表现为强调效率忽视公平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不断扩大。这种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拉大的转变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不适应,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强调效率无可厚非,但从我国的国家性质来说,忽视了公平就等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偏了路。因此,邓小平曾经多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①从当时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2001年我国已经摆脱了人均低收入阶段,到2010年迈进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②但与此同时,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和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经济增速相比过去几年有所下降,贫困发生率在中西部地区呈现上升趋势。除此之外,贪污腐败、道德滑坡等现象在这一时期不断出现,这与我们所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需要我们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通过逐步构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系列举措来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了要“在促进效率提高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② 李楠,陈慧女:《中国跨越“中等收入”的优势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11期。

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①。之后,江泽民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继续明确指出要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将“兼顾公平”作为重要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明确了这一原则。在具体实践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1992年到1995年这三年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两位数,最高峰时甚至达到了14.22%^②,相继而来的是基尼系数的不断攀升,到2000年首次突破了警戒线。这时“兼顾公平”已经不能有效遏制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迫在眉睫。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初次和再次分配时明确提出“初次注重效率,再次注重公平”的原则,并给予了更加具体的实施措施。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政策上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把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任务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公平必须贯穿于初次和再次分配中,“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③。这是公平第一次被放在了比效率还重要的位置上,不仅体现了公平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坚定的决心和勇气。

(六)强化提升(2012年至今):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考察时曾得出“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④的科学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向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对“物质文化需要”也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开始向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递进。新的主要矛盾催生了新的工作任务,在过去“短缺经济”背景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要通过“先富”打破平均主义,在确保效率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前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上更加突出“共富”,即着重解决发展起来后的分配不公问题。对此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以补齐民生短板的方式促进公平正义的解决问题思路,“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⑤。作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之一的共享发展理念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提了出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同时将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民福祉、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三个重要纬度上,将党

和国家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内涵和实践路径认识的深化。^⑥从内涵上看,共享发展理念除了包含共同富裕所要实现的在经济上国家和人民的富足、富裕,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层面的建设,即从经济层面通过精准扶贫确保全部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以此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从政治层面以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来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从文化层面提供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从社会层面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从生态层面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以确保人民获得健康和优美的居住环境等。特别是精准扶贫的提出,相对于过去的“大水漫灌”式扶贫的做法,不仅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根本原则和新时代需求的扶贫模式的创新和升华,而且更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进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⑦因此可以说,共享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发展。

二、实践向度: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的经验总结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共同富裕实践的历程,不难发现,伴随着世情、党情、国情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成立前30年、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一脉相承,使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呈现出连续性和完整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并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催生了“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② 王众,于博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探索与启示》,《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2期。

③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7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⑥ 陈娟:《论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2期。

⑦ 刘学敏,张生玲,王诺:《效率、社会公平与中国减贫》,《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5期。

政治前提。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共产党在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好了物质保障。从思想、政治、物质三个层面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的“中国经验”,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思想根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的百年实践,实质上就是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带领全体人民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的奋斗历程。^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更好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阶级投身到救国救民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具体情况的土地政策,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打消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建设,解决了由于物资匮乏导致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问题。这些举措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开启人民大众共同富裕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与发展社会生产,毛泽东立足于国情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通过建立起与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改造模式,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社会层面上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基础。^②但后期由于高估了绝对公有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低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性、复杂性,急于通过“一大二公三纯”等有悖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建设模式实现“赶超英美”的战略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些坎坷和挫折。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片面追求绝对公平不可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经济上的问题还是需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因此,在继承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先富后富”的方式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观。江泽民、胡锦涛在继承前两届领导集体政治智慧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要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和更加注重公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深入思考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而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共享是涵盖全体人民的共享,因此需要一方面通过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来做大“蛋糕”,为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又要根据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解决分配结果不均的问题,消除绝对

贫困这一基本民生问题,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③。同时推动社会公平建设,凸显效率服务于公平的新时代公平效率关系,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政治优势: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法在推进扶贫事业中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要么是执政党主观上没有或难以坚守执政初心,要么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放弃了共同富裕的初心。^④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是一个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组织,因此它所获得的稳定的执政地位也是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革命和变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下来。这不仅标志着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工程取得实质性胜利,同时这一时期形成的以强大整合和动员能力为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得以确立并持续发展,这些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尽管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但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在“先富”带动“后富”中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路径和方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即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及时进行自我批判、反思和纠正错误的强大政治能力。^⑤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⑥他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归结为党的领导,强调无论是哪个领域和方面,想要实现持续健康

① 王琳,唐子茜:《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新发展与经验总结》,《经济问题探索》,2017年第12期。

② 钟俊平:《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理念演进探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③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8/10-25/8660020.shtml,2018年10月25日。

④ 张春满:《论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国内国际维度的考量》,《探索》,2019年第3期。

⑤ 邢中先,张平:《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了确保顺利完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关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和系统观念为原则的基础上,将“十四五”时期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居民生活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卫生健康体系建设、脱贫攻坚、社会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水平的提高作为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具体措施。到第二个“一百年”时,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国人民将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巩固和提升。

(三)物质力量:构筑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保障体系

1.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和实现共同富裕所必备的物质保障需要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来实现。毛泽东肯定了马克思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为生产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工作重点从革命转移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通过“一五计划”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基础工业体系,为推进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但由于“左”倾思想的抬头,我们的经济建设走了一段弯路,共同富裕的发展没有如我们想象得那般顺利。邓小平深刻领悟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精髓,分析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同时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果断将工作重心进行了转移,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还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靠创新驱动的方式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将科技创新作为战略支撑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大作用。具体来说,从市场层面上看,要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推动创新中的主观能动性。从政府层面上看,要在制度、管理和文化创新上下功夫。当创新驱动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时,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

2.注重在公平与效率中寻找平衡点

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实质就是把经济发展与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造成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毛泽东一直都非常注重将发展生产与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为了打破过去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在解放区土地改革时期他就明确提出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大改造”的完成一方面在农业上为促进生产效率和农业产量的提高以及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工业上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但由于经验和认识的不足,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寄希望于通过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方式,使全体社会成员吃上“大锅饭”,进而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社会公平,而忽视了打牢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导致我们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彻底改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推进共同富裕实践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将社会主义与“贫穷”明确区分开,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的手段则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去处理发展起来后的分配调节问题。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在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与消除两极分化的关系问题,尽可能将两者统一起来,在推动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的同时,通过精准扶贫、调整收入分配和促进公平正义等方式来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合理诉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

三、价值向度: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的重大价值和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4页。

义在于,从国内来看,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为缩小两极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国际上看,它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相关理论和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理论价值

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百年实践从理论价值上看,它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相关理论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经验,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

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将“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①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提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以及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等诸要素共同铸就了共产主义革命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②这意味着共同富裕的实现包含了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普遍交往形成的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三大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又再次明确实现共享发展一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提出通过创新驱动继续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二是强调共享发展的渐进性,通过渐进的发展过程推动世界历史的转变;三是将共享发展的实践目标与人类世界联系起来,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助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继续迈进。

2.为世界各国贡献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的百年实践进程,也是我国从绝对贫困走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再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的历史发展过程。百年来,我们逐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不照搬别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标,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变革和创新实践路径,不仅创造出令世人赞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而且还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一方面我国的扶贫工作再上新台阶,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消除;另一方面整个经济社会也开始逐步向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一步步得到实现。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即使是拉美、中东这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走一条经济快速发展道路实现了向中等国家收入水平的跨越,但依然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普通劳动者仍旧无法从高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公平的收入和幸福,相反,随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问题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打破了这一发展困境,找到了促进经济发展与保障公平正义的平衡点,为世界减贫事业和各国认识这一发展规律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实践价值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华儿女的梦想,也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百年实践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既是中国向世界减贫事业提供的宝贵经验,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开启共同富裕的大门找到了“金钥匙”,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1.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是世界减贫事业的“助推器”

消除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必然逻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精准扶贫”的方略,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来推进扶贫事业的发展,并如期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彰显了中国在世界脱贫事业中的大国担当。放眼全球,贫困问题仍然是当前制约人类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剧,全球反贫困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9899万农村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不仅成为彪炳史册的一大奇迹,更推动着世界减贫事业的发展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2.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列宁曾明确指出,消灭贫穷“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③。在他看来,在私有制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② 王金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③ 《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2—123页。

景下的人会随着社会权利的增长变得更“利己”，从而向着自己固有本质的异化方向发展，因此他赞同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变革。也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使人性得到复归，确保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彻底解决，进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只有在作为人类社会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打破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残酷剥削而造成的无产阶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异化，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而且还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中有力地推动着共同富裕的实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中所蕴含的“人人享有、各得其所”的根本价值取向与共产主义中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完全契合^①。这一方面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从实践上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3.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百年实践促进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当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悬殊的利益分配又造成了世界贫富差距的

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广大下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差异的扩大。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这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是不可持续的。在他看来，“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②。因此，他在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上将实现非洲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好了“头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全人类找到消灭贫困和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提供了指引。一方面，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人类命运共同体”单打独斗，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去共同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内立足于国内实际国情，在促进共享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对外则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些都为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刘旭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② 习近平：《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0/content_5560307.htm，2020年11月10日。

（责任编辑 王华生）

A Study on the Triple 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u Xuwe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only the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but also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blazing a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ne hundred years has experienced three dimension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at is, i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it has experienced six stages of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ld and new, tortuous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exploration, in-depth promotion, and strengthening and upgrading; In terms of practice, the CPC adheres to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seeking practical result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value targe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ne hundred "Chinese experience" which is formed by the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not only enriched the Marxist theory related to common prosperity,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by "Chinese wisdom" and "China", but als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 the world therefor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mon prosperity; historical dimension; practice dimension; value orientation